

桂
堂
文
库

郑家建 | 著

透亮的纸窗

TOULIANG DE ZHICHUA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透亮的纸窗

郑家建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詹素娟

封面设计:周涛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透亮的纸窗/郑家建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

ISBN 978-7-01-013879-4

I. ①透… II. ①郑…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4335 号

透亮的纸窗

TOULIANG DE ZHICHUANG

郑家建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4.25

字数:385 千字

ISBN 978-7-01-013879-4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福建师范大学是一所百年学府,肇始于1907年由清末帝师陈宝琛先生创立的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开示福建高等教育的先河和师范教育的优良传统,又承传1908年筹设的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1915年兴办的福建协和大学两所教会大学的学科积淀,历经百年建设,发展成为东南名校。

我校中文系与校史一样源远流长,主要由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国文科、协和大学与华南女院等中文系科发展而来,于2000年改设文学院,现包括中国语言文学、秘书学和文化产业管理三系。文学院的学术源流,既呈现了陈宝琛、陈易园、严叔夏、董作宾、黄寿祺诸先贤奠定的传统国学,又涵衍着叶圣陶、郭绍虞、章靳以、胡山源、俞元桂等名家开拓的现代新学,堪称新旧交融,底蕴深厚。其中,长期为学科建设殚精竭虑而贡献卓著者,当推前后执掌中文系务三十年的经学宗师黄寿祺(号六庵)教授和现代文学史家俞元桂(号桂堂)教授。

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进程,我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稳步发展,屡有创获。由六庵先生和桂堂先生分别领衔的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于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全国首批硕士点;1995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由国家教委确认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8年一举获得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博士点,2000年又获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2001年设立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3年获取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2007年中国现当代文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此外,还有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博士

2 透亮的纸窗

授予权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国家级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教学团队各1个和精品课程4门,综合实力居全国同类院系的先进行列。

先师桂堂先生,1942年毕业于协和大学,系国学名师陈易园、严叔夏先生之高足;1943年考入中山大学研究院中国语言文学部,又师从文献学家李笠教授和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1946年获文学硕士后,受严复哲嗣叔夏先生举荐回母校执教,直至退休。1956年起任中文系副主任,协助六庵先生操持系务,1979年接任系主任,至1984年卸任。先生从教五十年,早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史,1951年起奉命转治现代文学,晚年创立现代散文研究方向,著有《中国现代散文史》、《桂堂述学》及散文集《晚晴漫步》、《晓月摇情》等,与六庵先生同为我校中文学科德高望重的鸿儒硕老。文学院此次策划出版两套学术文库,分别以两位先师的别号命名,不止为缅怀先师功德,更有传承光大学术门风的深长意味。

《桂堂文库》首批辑录11种,均来自我校现代文学学科群三代学者,包括文艺学、比较文学和语文教育学等学科。老一辈名师中,孙绍振教授以《文学的坚守与理论的突围》汇集他在中外文论、文艺美学和文本解读方面的精品力作,姚春树教授则以《中国现代杂文散文杂论》显示精鉴博识的特色。中年专家有6种,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帆的《表述与意义生产》畅论当代文论和文学研究的前沿关键问题,辜也平的《多维牵掣下的苦心雕镂》在巴金研究和传记文学探索上有所创获,席扬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典型现象”》中阐发学科史和思潮史的新见,潘新和专门论述《“表现—存在论”语文文学视界》,赖瑞云则细心探讨文学教育的《文本解读与多元有界》的理论与实践,拙作《现代散文学初探》只是附骥而已。新一代学人有郑家建的《透亮的纸窗》、葛桂录的《经典重释与中外文学关系新垦拓》和朱立立的《阅读华文离散叙事》,在各自领域显示学术锐气。原作俱在,可集中检阅我们学科建设的部分成果和治学风气,我作为当事人不宜在此饶舌,还是由读者独立阅读和评议吧。

汪文顶

二〇一四年夏于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

自序

波德莱尔在散文诗《窗户》中写道：“一扇被烛光照亮的窗户是最深沉、最神秘、最丰富、最黑暗、最炫人眼目的。”在我看来，时间就是这样一扇紧闭的窗，世人从未探得窗内的究竟。

惟有——

生命透亮它的纸窗，犹如穿帘而进的月光，蕴藉着阴晴圆缺，盈虚消长。

信念点亮它的寂寞，仿佛在瞬间挂落天际的奔星，敲击着旅人迅疾的足音。

理性映亮它的暗隅，恍若东方的微光，悄然之中唤醒沉睡的远方。

于是——

越过你伫立的背影，我看见，“在或明或暗的窗洞里，生命是活的，它在梦想，在受苦”，也在抗争，更在生长。

是为序。

郑家建

2014年3月7日夜写于北京旅次

目 录

CONTENTS

上

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出发 / 3

论 20 世纪中国小说研究的几个生长点 / 23

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起源语境

——以中国传统空间知觉方式的变迁为观察点 / 38

置身于思想史背景的“五四” / 53

文学史的叙述问题 / 100

中

知识之美

——论周作人散文中知识的审美建构 / 109

鲁迅:边沿的世界 / 144

戏拟——《故事新编》的语言问题 / 172

仰看流云——《朝花夕拾》的诗学阐释 / 197

下

清华国学研究院述论 / 255

后 记 / 381

上

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出发

具有学科意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迄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早已不再年轻”。正如一个生命体的过程一样，这期间有生机、成长和收获，也有挫折、困惑甚至危机。站在今天的语境，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出发，并非要否定这一学科已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而是新旅程之前的一次整装待发。

问题的提出

首先就让我们重新来审视一下这一学科在深层次的结构上存在着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否会潜在地引发学科“危机”？在我们看来，下面几个因素的存在及其制约性是不能不正视的。

（一）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制约

如果说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主要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话，那么，80 年代以来，这一学科的研究在思想方法上主要是受制于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其主要表现就在于，研究者们自觉而热烈地使用西方的理论话语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并认为西方文学（文化）中有的东西，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都有所“体现”或“萌芽”。比如，80 年代中期，存在主义思潮开始引入中国学术界，鲁迅与存在主义的关系就成为对这一思

潮直接反响的“热点”问题之一。大量研究论著的最终结论是：“鲁迅思想与存在主义有一致之处。”然而，问题却在于，即使不否定这样的事实：鲁迅思想的某些特征确实与存在主义相似，或鲁迅思想确实具有存在主义式的深度，但是，重要的不在此，而在于其有别于存在主义的自我独立性，因为鲁迅永远不会是萨特第二或加缪第二。因此，鲁迅思想及其艺术的自身独特性又在何处？这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之所在。可以肯定地说，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不在于他和世界思想史上某一位思想家或文学家相似或一致，而是有其独立的思想存在和存在形式。因此，这就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理论话语、理论方法的“对象化”与“中国化”问题，即我们必须通过研究，给予中国现代作家一张自己的“身份证”，而不是一张通往西方的“护照”。

（二）普遍主义倾向

18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在西方形成了一股强劲的科学主义信念，人们认定只要正确地使用科学方法或技术手段，就一定能找到隐藏在事物或现象背后所谓的具有本质性的“规律”。这种研究理论最早兴起于自然科学领域，后来就扩展到整个人文科学领域，甚至把已往的人文学研究方法拒于“科学方法”大门之外。受这一强势的研究理念的制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难逃此例。研究者们无论在文学史写作，还是在作家、作品的研究中，都义无反顾地确信，在文学史过程中，在作家、作品或文学运动、思潮、现象背后，必然存在着某种有待探寻、发现的“本质意义”或“某种规律性的特征”。当然，这种普遍主义的研究倾向表面上看起来，确有“一口吞尽长江水”的干脆、明快的气势，但是，这又恰好回避了历史存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且问，如果创作对于某个作家而言，仅仅是“情绪的体操”，那么，文本中所谓的“本质意义”又何处追寻？如果创作对处于某一语境的作家来说，仅仅是一种“无意义”的“游戏”，那么，又何处握住“规律”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呢？在这方面，传统儒家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多样性理解，对我们是有启发的：《论语》、《孟子》中一方面强调‘士志于道’，‘士尚志’，‘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等等严肃、超越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注重轻松活泼的精神，例如《论语》所说的‘游于艺’便是明证，只有具备了‘游’

的精神,知识分子才能够达到‘乐道’、‘乐学’的境界。《札记·学记》说:‘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这段话恰恰可以说明‘士’或‘君子’为什么要‘游于艺’。孔子常常重视快乐的‘乐’,强调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灵,作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地步。”^①过分地相信或强调文本背后的所谓“本质”意义,往往会走向相反的一面,即使审美成为意义的附庸。台湾著名小说家张大春就曾表达过这样的疑问:有时候——不,很多时候,小说家自己也不得不被诱迫着在出版序言中,在演讲会场上,在访问纪录里留下失格的“串供”之辞,他会这样说:“在这篇小说里,我想表达的是……”倘若上面这一行的“……”果然存在,小说家又何必苦心孤诣地写一篇小说呢?为什么不索性“……”来得明白痛快呢?^②因此,为了回避研究中普遍主义的迷误,我们应该提倡一种“相对主义”的研究心态,正如程颐所说:“人心常要活,则周流无穷,而不滞于一隅。”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尊重文本中的“无意义”存在,允许作家的创作仅仅是“游于艺”而已。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不经意间发现:“文学的本体论其实多么简单!它是一个词在时间中的奇遇。”^③

(三) 学科边界的无限制扩张而导致自我销蚀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历史语境、发展过程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紧密相关,这就使得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必然要涉及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各因素的外在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新起步时,这一学科就表现出一种“雄心壮志”,研究者们把讨论的触角伸及中国现代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各领域,试图在这些领域都一试身手,有些研究者甚至在这些领域已“乐不思蜀”,这样就使得这一学科负载着过多的非文学性的意义内涵。当然,自然科学的学科发展史表明,学科的交叉、融合往往是学科新生长的动力,但是,人文学科是否也遵循同样的学科发展规则

① 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② 张大春:《小说稗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③ 同上书,第18页。

呢？人文学科的交叉、融合是否有限度呢？交叉或融合的结果是否要以销蚀原学科界限为归宿呢？这种交叉或融合是否会有负面的效应呢？我们认为，这些担心或疑问并非不必要。在我们看来，无论如何，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首要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在它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中，究竟提供了哪些新的审美经验、新的审美形式？检视已有的研究，在这方面并没有给出一个富有说服力的回答。当新兴的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更是使得众多的文本成为了文化分析的个案。“文学性”、“审美性”、“形式”等文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在文化分析的框架内不断地被边缘化，“文学研究”成为五光十色的文化分析“百衲衣”上的一块可以拆洗的“布片”。审美的意义消失了，作者主体的存在消失了，呈现给我们的是“阶级”的概念、“权力”的概念、“性别”的概念、“种族”的概念。面对这种学科边界因扩张而自我销蚀的状况，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有一次理论与方法的“瘦身运动”，应该把“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即重新确定自己的学科边界、学科范畴与学科架构。

任何一种学科危机都是逐步演化而成的，同时，“所谓的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c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①。虽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未达到这生死攸关的路口，但是，保持一份清醒的心态是必需的。为此，我们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再出发的几个起点。

再出发一：以传统来诠释现代

以现代的学术观念、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有许多成功的典范。比如，王国维的史学研究，傅斯年就认为，《观堂集林》中有许多作品，特别是《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二文，皆可作为新式史学研究的“模范”。^②郭沫若也认为，尽管王国维“思想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92页。

② 转引自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82页。

情绪”若干方面还是“封建式的”,但他的“研究学问的方式是近代式的”,他所留下的知识遗产,就“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一段异样的光辉”。^①陈寅恪也十分推崇王国维“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考证”。^②陈寅恪自己的学术研究也是如此,早在留学期间,他在《与妹书》中就断言:“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楼。”^③仅限20世纪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就有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闻一多的《〈诗经〉研究》等,这些都是运用现代学术观念与方法来研究、发掘传统文学内涵的范例。既然可以用现代的学术观念、方法来诠释传统,那么,翻转一下思路,运用传统资源来诠释现代是否也是可行的呢?在这里,我们必须先把这一思路与以往研究中所经常出现的诸如“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传统的关系研究”相区别开来。我们认为,后者的研究重点放在“现代”层面,其研究思路是“传统/现代”的二元式,并往往陷入一种“格义”式的比附。所谓的“格义之比较,乃以内典与外书相配拟”^④,也就是说,这种研究模式强调的是现代文学中的某些因素在传统文学中也存在或者与传统有相似性。而我们这里所提出的“以传统来诠释现代”,其思维的起点是放在“传统”这一面,就是要看一看传统的文学、美学资源以怎样的方式渗透进现代文学的审美样式和审美经验之中,存在下来并积淀为一种潜在而积极的审美源泉。我们通过这种立足于传统角度(旧)的观照,为的是发现那些现代(新)的东西。在这里,我试图举周作人关于中国现代散文的某些独到看法为例来加以分析。周作人在评论中国现代散文时,十分强调要把中国现代散文与明代的公安派、竟陵派散文联结起来。他说:“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学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实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使他有一种新气息而已。”^⑤“我常这样想,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

① 转引自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82页。

②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7页。

③ 同上书,第355页。

④ 同上书,第185页。

⑤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样的进展。在理学与古文没有全盛的时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当的发展,不过在学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气息了。”^①“现在的文学——现在只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没有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学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②“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③周作人强调明代公安派、竟陵派以来中国散文的源流对现代散文的滋养,从一个方面回答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中国新文学的各种文体中,现代散文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在诗歌、小说、戏剧之上?简单地说,这是否因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潜在地与深厚的中国散文历史渊源接续上了呢?也许正如周作人所说的那样:“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④顺着周作人的这一思路,我们可以进而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现代小说中优秀作品多是那些充满意境和抒情氛围的文本,这与中国文学中的写意、抒情传统有何关系?从中国文学中的写意、抒情传统出发,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特征能否有一个更内在、更丰富的把握呢?这些问题耐人寻味。回到文学史,我们又将遇到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在现代白话文确立之后,文言是否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已真正的“死亡”?为什么我们在鲁迅、周作人等人的散文中能不断看出文言的“痕迹”的潜存?而且常常正是因为有这些文言的“痕迹”,才使得他们的散文、杂文的审美意味更加的“醇厚”。周作人就曾比较过三种不同的散

①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文文体的审美价值,他说:“据我个人的愚见,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①“我也看见有些纯粹口语体的文章,在受过新式中学教育的学生手里写得很是细腻流丽,是葆有造成新文体的可能,使小说戏剧有一种新发展,但是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②郭沫若在《庄子与鲁迅》一文中,举《庄子》为例,说明“鲁迅爱用庄子所独有的词汇,爱引庄子的话,爱取《庄子》书中的故事为题材而从事创作”,其中有“词汇的引用”,“有完整的词句”的引用等,并一口气举了近三十个例子来充分说明鲁迅创作思想与艺术和庄子的关系。^③从上述周氏兄弟的例子可以看出,现代白话文确立之后,文言在现代作家创作中的存在状态很值得深入讨论:文言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存在?文言的语言形式及其美感对现代白话文的审美创造又产生了哪些积极的影响?我认为,这些都是开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出发的重大课题。

再出发二:“明于知人心”

尽管有理论不断地在断言:“作者已经死亡。”但文本毕竟不可能“无”中生“有”,它必然是出自某一个特定的作者之手。作者的个性、情感、意志和想象力必然要深刻地浸染在自己所创造的文本之中。古往今来的世界文学史概莫能外。正如鲁迅所言:“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

① 周作人:《志摩纪念》,《新月》第四卷第一期,1931年。

②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③ 郭沫若:《庄子与鲁迅》,《中苏文化》(半月刊)第八卷第三、四期合刊,1941年。

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①因此,对文本的心理分析或精神分析是我们重建作者与文本之间有效通道的最重要的阐释方式。这一方法不仅在文学研究中大有作为,甚至在以社会、经济、政治、事件为对象的历史研究中也拥有广阔的施展空间。“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不少心理学家和史学家都注意到有些历史现象非借重心理学不能得到彻底的理解,因而而有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的兴起。当时心理学家艾里克逊(Erik Erikson)的影响尤大,因为他对马丁·路德和甘地的研究都属于史学作品,而《青年路德》一书更轰动一时,争议极大。‘生命史’的概念便是他发展出来的。”^②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就曾用心理分析与史学分析交互为用的方法研究南宋孝宗的心理历程,即他的认同危机、心理挫折以及这一系列心理向度对他的“末年之政”的深刻影响。^③

请看余英时的分析:

他(孝宗)“小年极钝”,高宗教他读书便吃足了苦,后来对他一直没有多大信心,以致“立储”事总是犹豫不决。内禅以后还是对他不放心,大事仍然抓在自己的手上。……在理性的层面,孝宗自然不能不接受父皇的无上权威,甚至还感激他的训诫和关切,但在潜意识中,反抗情绪的滋长则是不可避免的。孝宗对于高宗既“爱之深”也“恨之切”的情感冲突(即“ambivalence”)在“三年之丧”这一具体问题上呈现得非常清楚:“三年之丧”确然表达了他所说的“大恩难报,情所不忍”一番心理;这是显意识层面之事,绝不可视为虚伪。但是为了强调自己所行“三年之丧”合乎“古礼”,而发出“朕欲救千余载之弊”的责言,他实已站在胡寅一边,批评绍兴七年高宗行短丧之失了。这则出于潜意识的作祟。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儿子长大了,父亲原有的伟大形象便开始改变;儿子对他会越来越不满,从而学着去批评他并重新估定他在社会的位置了。批评犹如露出水面冰山一角,指示我们下面还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

②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699页。

③ 同上书,第740—764页。